

中国扇文化探究

■杨祥民

中国扇子历史悠久,源远流长,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,被赋予了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民族特色。自古中国就有“制扇王国”的美誉,数量之大品种之多,皆居世界首位。如今进入二十一世纪,在电扇、空调等电器普及和盛行的时代,扇子却依旧历变不衰,风光无限。

一、扇子的起源及功能形制演变

何时产生最早的扇子,它具体是什么样子的,这已无实物可考。有人认为我国最早的扇子是黄帝禹舜时期的“五明扇”,由五光十色的雄雉尾羽编织而成,状如鹊翅或似帘幕。从历史文献上看,晋人崔豹在《古今注》中记道:“扇,又名箴,黄帝内传有五明扇,天子用雉尾扇,即掌扇也。舜广开视听以求贤人作五明扇。”可以说,“五明扇”是中国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扇子了。《方言·杂释》中提到,“扇自关而东谓之箴,自关而西谓之扇,今江东亦通名扇为箴。”中国的文字是非常有讲究的,从象形、会意的角度分析,“扇”字从“羽”,“箴”字从“竹”,所以可以判断当时的扇子应该是用竹子或羽毛制作的。《管子·四时》中有“禁扇去笠”,其中的“扇”就属羽扇。有关早期竹扇“箴”的记载并不是很多,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量竹编器物,包括竹席、竹篮、竹篓、箴箕、竹箩等等,编织方法已经非常复杂多样化了,所以不难理解当时人类发明编织出竹扇也应是很简单平常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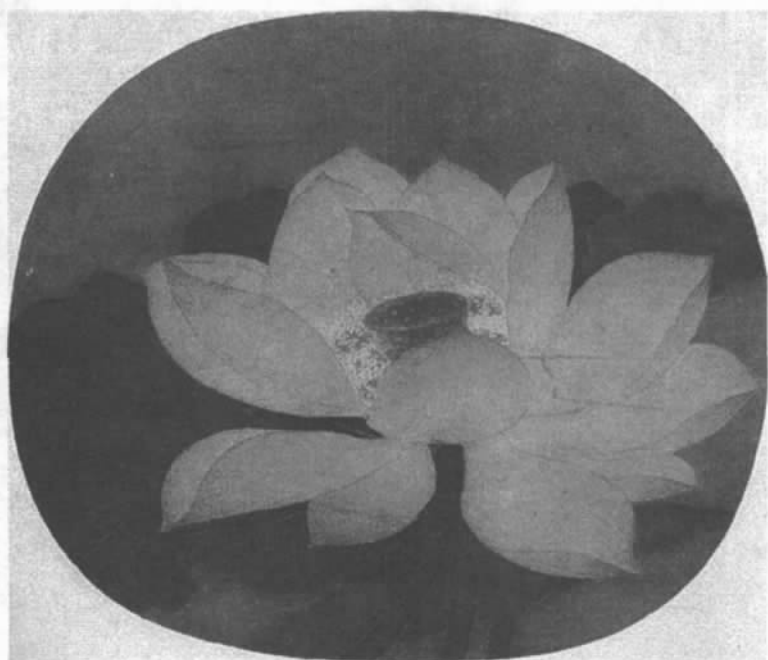
这样一来我们就把扇子的历史追溯到了原始社会,上面所提到的羽扇、竹扇都已经非常完善,体现出较为成熟的制作工艺,扇子的起源还应往前找寻。马克思认为,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,意味着人类

的诞生。远古时代的人类在烈日炎炎的夏季,随手摘取植物的叶子或禽类的羽毛,一番简单的处理或加工后就能用来引风纳凉,遮阳取荫,这就是扇子的萌芽,也就是最早的扇子。只是到了上古三代,才开始有了扇、箴的命名并见于文献记载。

扇子产生后发展很快,无论在材料上还是设计制作上都日益丰富起来,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生活的各种需要。竹扇、羽扇被人们进一步加工和美化,用竹篾编织的扇面有条不紊,纹饰图案多种多样;制扇的羽毛不仅是雉尾羽,还有鹊翅、鹤羽、孔雀翎等等。随着纺织技术的进步,素绢、花绫、细罗等丝织品也纳入制扇的材料范围,产生了更加轻便盈巧的纨扇,或称为团扇、绢扇,而且由于它颇受仕女的青睐,所以又有宫扇之称。后来制扇的材质不仅有名贵的纸张、木材、竹材,也还有象牙、玳瑁、金银等。但下层劳动人民主要是就地取材,生产和使用低廉耐用的葵扇、蒲扇、蕉扇和麦秆扇等。

在古代阶级社会里,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,这深刻体现在扇子的形制上面。早期扇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长柄和短柄之分,长柄扇是下

层奴婢仆从侍候主子的工具,具体职能又分为两类:一种是仪仗扇,名障扇或掌扇,明田艺衡《留春日札》中称“扇如手掌而立张”;其功能并不是用来招风纳凉的,先是在权贵们出行时作为遮尘蔽日的工具为他们“障面”,如《古今注》所记“即辑雉羽为扇,以障翳风尘。”后来渐渐用于显示贵族帝王威仪的仪仗中。《周礼》中记载:“巾车掌王后之五路重翟”,重翟即是障扇。汉代又称“障翳”,为帝后专用之物。汉景帝时,其次弟梁孝王刘武“得赐天子旌旗,出从千乘万



△出水芙蓉图

骑”；破格使用雉扇仪仗。魏晋时期诸王侯皆僭越使用，渐成定制。南朝江夏王刘义恭为宋孝武帝所忌，于是下诏规定：王侯障扇不许用雉尾扇，改用红色“朱团扇”。为了显示帝王的威严，唐玄宗时大臣萧嵩又订立制度，在正殿上置扇，皇帝升殿受朝时，御座之前用六柄掌扇相合遮住，待皇帝登前坐定后再开扇受拜，左右各留三柄立侍；退朝时也要先合扇座前，等皇帝离座后再撤扇，以后相沿成制。宋高承在《事物纪原》中对此有记述：“上将出，所司承旨索扇，扇合上坐，坐定扇去。礼毕上将退，又索扇如初。”唐宋诗句里“云移雉尾开官扇”，“雉扇初开散御香”，都是指此事。从唐画家阎立本的《步辇图》中可以看到，唐太宗端坐辇上接见吐蕃使者，左右各有宫女持扇侍立，愈显太宗雍容华贵。

在大殿中置扇的用处，显然不是障尘蔽日，而是使九五之尊的皇帝不轻易露其颜面。《宋史·仪卫志》里说的明白：“盖谓天子升降俯仰，众人皆得见之，并非肃穆之容，必合扇以障焉。”总之，扇子又增加了为统治阶级修饰威严的作用，而且在后来朝代的发展中，仪仗扇在使用数量、规格以及质地上都有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和等级区别，它成为统治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

长柄扇的另一种类是用来取风遮荫的工具。晋王子年《拾遗记》中记周昭王“聚丹鹊毛羽为扇”，使两名侍女摇动，“清风四散，泠然自凉。”汉代一将军夏日午睡时身披重裘，卧层层厚垫，命十余人之为之打扇，不觉其凉，就下令将打扇的侍奴全杀了。不久军中传开歌谣：“奴为将军何可羞，六月重荫被狐裘，不识寒暑断人头。”古代豪门权贵少有自己打扇者，莫不强迫役使奴婢仆从为其鼓风驱热，为此特把扇子的柄做长以便于使用。这在汉画像砖石中有反映，唐周昉的《挥扇仕女图》中也有一男侍持长柄团扇为贵夫人鼓风不已。从八十年代出土的实物扇上也可以看到，短柄扇多发现于中小墓中，长柄扇仅见于大中墓里。而这些长柄扇长约两米左右，墓主人不可能自己拿着使用，是用来差遣别人为之扇风的。

短柄扇为持扇人自用，不具有使役他人的性质，而且它还具有便捷、小巧的特点，功用上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一方面它也具有祛暑、招凉、遮阳等作用，普通平民百姓自摇其善自得其乐，后来一些贵族士大夫也手持小扇一把，明宣宗也称叹，“扫却人间炎暑，招回天上清凉。”南唐画家顾闳中名作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也有主人翁袒胸露腹，挥扇听乐的场景。无怪乎有人称扇子为“凉友”，“净君扫浮尘，凉友招清风。”人们对扇子心存感激，即使是破扇子，也称赞它虽然“蔽日无全影”，但仍然“摇风有半凉”（南朝陈许佺）。尽管暑去秋来，也要提醒人们“莫以凉风

多，弃捐敝篋里。试记无风时，是谁引风起”（明僧大遂《秋扇诗》）？以至于把世上忘恩负义的事都比喻成“秋扇见捐”。

另一方面，短柄扇也具有个人装点修饰的作用。它不同于长柄大扇理性的威严工整，而是流露出感性的亲切、潇洒。唐王建《调笑令》中云：“团扇，团扇，美人频来遮面。”就是说女子用扇子来掩面遮羞，更显其温柔可爱，具有装点仪态的美饰功效，所以古代扇子又叫“屏面”“便面”。《汉书》里的《王莽传》与《张敞传》，有颜师古作注：“屏面即便面”“便面，所以障面，盖扇之类也。”山东嘉祥武氏石祠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石中，还可以看到羽人、仙人手执便面的画像。

古代还有“文不离扇，武不离刀”之说，文人士大夫持扇指点江山，谈古论今，更添几分雅风文气。“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檣櫓灰飞烟灭”的三国周瑜，成为儒将风范的代表。至于后来携带更加方便的折扇兴起，许多才子佳人更是扇不离手，成为风流潇洒、典雅高贵的最佳设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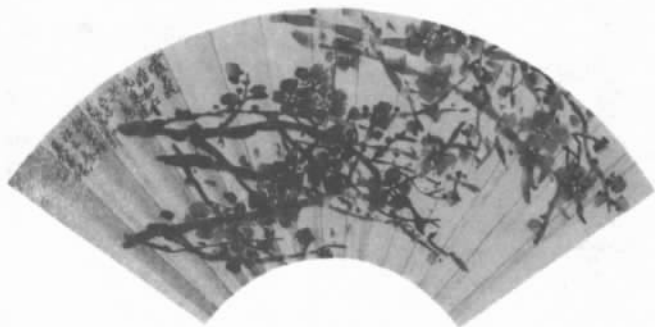
折扇是短柄扇的进一步发展，也可以说是一种无柄扇。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，“人”的意识逐步觉醒和增强，剥削和等级制度渐渐受到抵制和消灭。特别是近代以来，民主、平等、自由思想深入人心，在这个大背景下，长柄扇只能慢慢退出历史舞台，现代化的电风扇、空调更使它难有立足之地。短柄扇特别是折扇兴盛起来，并广泛受到人们的欢迎。

二、扇子的艺术文化魅力

前面所讲扇子取风、仪仗、障日、遮面（饰人）等种种作用，都是由扇子本身所提供的，但那仅仅是作为物质扇子的物质功能，这不能保证它们永远屹立于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。作为文化扇子的文化意义，则赋予它不朽的社会生命力。扇子纳凉，不意成艺，扇子也逐渐从一种功能符号演变为文化符号。

中国扇子文化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性特点，多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艺术样式都汇聚于扇子之中，如中国画艺术，书法诗词艺术，雕刻艺术等等，其做工之讲究制作之精妙，又体现出工艺美术的特点。

首先从书画入扇说起。中国文人有处处留墨的雅好，扇子一经文人和画家之手便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扇与书画结缘具体始于何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，对这一历史总体看来，它具有从“书画之于扇面”发展到“扇面之于书画”的一个逐渐演变过程。“书画之于扇面”是以扇面为中心，书画为扇面服务，被动地适应扇面的形制法规。可以说此时扇子是主体，书画艺术是作为装饰艺术为其所用的。“扇面之于书画”则以书画为中心，扇面为书画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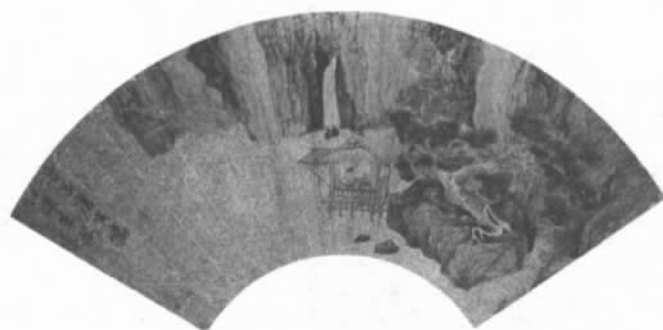


△吴昌硕



△山水扇面

张大千



△扇面

明,唐伯虎



△扇面

明,沈周

务,书画主动运用扇面的形式来发挥自我的艺术魅力。也不妨说此时书画是主体,扇面是作为展示舞台为其所用的。早期有关扇面艺术的可查史料中多是“书画之于扇面”的例子,最早的记载唐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中,是三国时杨修为曹操画扇,误点为蝇。《晋书》中记有王羲之“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,羲之书其扇,各为五字。”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书扇很多,宋虞酥《论书表》中称当时整理他们的墨宝中有“书扇二秩二卷”。另有记载南朝遽道愍、章继伯“并善寺壁,兼长画扇。”萧资“尝画团扇,上为山川。”虽然历代都有名人绘扇留迹的记录,但是根据出土的实物扇和壁画绘画中的扇,我们可以发现在宋代以前,它们大都是纯工艺性、日用性的装饰扇,古板,单调,扇面缺乏艺术性。

进入宋代后扇面书画艺术出现了繁荣景象,也正式开启了“扇面之于书画”的历史格局。其时画家于扇面上作画,已是主动借用扇面的艺术形样,为作品增添了自然、活泼、清新的气息,以至于扇面作为一种小品性的绘画形制完全从扇子物中脱离出来。《宋人画册》中百幅小品,仅纨扇面就有六十多幅,而且题材丰富,刻画细腻,千姿百态,意趣盎然。明清以来文人雅士尤喜在团扇、折扇上题字作画,“明四家”“清六家”“清四僧”“金陵八家”“扬州八怪”到近代的任伯年、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张大千等,都有大量的扇面作品传世,书画扇面成为中国书画艺术宝库中耀眼的“别体之作”。

团扇画以及稍后兴起的折扇画,与长轴大卷相比只是移大作小,视角变化。如同通过显微镜看世界,它能够指引观者的目光,集中观者的精力,近观精察,细心品味微观艺术世界里的奇妙景象。与大幅山水的山高水远相比,小巧的扇面山水中一草一木、一水一石更能表现出天地自然的内心世界,传达出更加细微恰切的情感。

古代扇面,很多是书而不画,因为文人皆能书但未必能画。到宋代文人画家兴起后,书画共扇的情况开始多起来,并且发展到诗、书、画、印同扇子融为一体,古人于方寸之间殚精竭虑、苦心经营,终于造就了赏心悦目的扇面艺术。

扇子的另一部分即扇柄扇骨。历史上团扇雕柄很早就出现了,折扇扇骨雕刻工艺对其作为艺术品来说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。扇骨对全扇起固定和支撑作用,本身又作艺术装饰,刻制扇骨即指在折扇边骨上雕刻,大多一侧刻字,一侧镌画,相互配合,有时扇骨雕刻内容与扇面内容相关,两者相辅相成不仅丰富了扇子的文化内涵,而且提搞了扇子的艺术审美价值。

应该说檀香扇、象牙扇与雕刻的关系是最密切的,但

从扇子的发展史看,竹刻艺术对扇雕工艺的影响最为深刻。在唐代就有了竹刻,当时宫廷已规定给翰林学士赐“青团镂竹大扇”。到明清时竹刻艺术臻于完善,三四百年间涌现出大批优秀的竹刻家,他们无不或多或少的从事扇骨雕刻,也存在精粗、高下、雅俗之别。伴随着折扇的兴起,许多刻竹制扇的艺人也见于论著,《秋园杂佩》一书记载,“宣德、弘治之际,李昭,马勋皆以制扇著名。”他们可以凭“一技之长,皆知名海内”;有些制扇者被誉为“可上下百年,保无敌手”。扇雕工艺伴随着竹刻艺术的发展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,其中主要有“翻簧刻”与“留青刻”两大类,载体有平面、立体之分,技法有阳刻、阴刻、皮雕、模雕、深浅浮雕和镂空雕之别。但在具体的制作和实施过程中,还要注意就材质的天然性质形态因材施艺,独运匠心,以获取其天然意趣为贵。清代后期开始,竹刻技法倾向于追求书画的笔墨情趣,扇骨竹刻之难不在刀法,而要求刻手具备书法、绘画、篆刻以及诗词歌赋等造诣。竹刻艺术要求古雅,追求文逸超俗的效果,以体现文人氣息为上,崇尚具有书卷气息的文作,对有官宦权贵气、商贾富庶气的匠作则不以为然,这正应了中国一贯的重文逸求雅格的传统思想。

扇骨雕刻内容极为广泛,书法上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以至三代的甲骨、钟鼎、石鼓文,图案上山水、花鸟、人物、上古纹饰、汉魏碑刻、古泉刀币,或阳文,或阴文,或阴阳兼顾,真是千姿百态缤纷多彩。扇骨的形式也是多样,有方端、圆端、鱼尾、椭圆、葫芦、雁首、梅花、花瓣、如意、橄榄、镂花、云头、垂露、瓶口等众多样式,新意迭出,数不胜数,所有这些都有力地开拓了扇子艺术的广阔天地。

中国的悠久社会历史铸就成今天精彩的大扇子艺术,其社会文化影响范围早已超出了扇子本身。扇面、扇骨之外,扇子的附件如扇坠、扇匣、扇囊,也受到了艺术的熏陶。扇坠乃系于扇柄尾部的饰物,宋以后开始流行,扇柄附坠,使扇形延伸,余韵连绵,而且整个扇子给人重心下移的感觉,不嫌其摇动飘忽。扇坠多以香木、玉石等做成,或直接在扇柄下坠以流苏、香囊,其本身质料也衬托出执扇人的身份素养。装盛扇子的扇匣、扇囊,或雕饰或绣治,也成为精心打造的艺术品。对盛具的重视更反映出对扇子的重视,这种重视远远超出了一件实用器物的价值。“但求扇中艺,何劳扇底风。”自古用扇者止言其效,赏扇者乃审其美。佛家说,“一花一世界,一沙一天国”,人们从小小的一面扇子中,看到的是无比丰厚宝贵的艺术文化,中国扇子的性情、神韵、意趣,已广泛渗入生活中并不断得到扩展、充实,这就是扇子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赏识,并和谐地融入现代社会的原因。